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二三期 ——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111b)

【口述历史】	草根政治：一条至死不渝的道路 ——伊林、涤西口述（下）	米鹤都·墨 诞
【研究述评】	“两个文革”说：权力斗争还是社会冲突？	徐友渔
【一家之言】	文革、自由派和毛派	袁庚华
【各抒己见】	未完成非毛：历史的遗憾	郑也夫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口述历史】

草根政治：一条至死不渝的道路
——伊林、涤西口述（下）

采写：米鹤都·墨 诞、编辑：米鹤都

(续 z k 1 1 1 0 d)

◇ 上山下乡和林彪事件

涤西：1968年下半年，学校开始分配了，刘握中到山西插队去了。我虽然脱离了群众专政，但学校没有分配我，同学们都走了，我还在学校呆着呢。

后来，东北建设兵团来招1969届的学生。因为是边境，人家对政治条件要求还挺严格。学校的军代表对我还不错，他说，你去跟建设兵团的人说说，看人家要不要你。你拿不下来也没损失。我这人亲和力强，能聊，给人的印象也不错。于是，我就自己上去公关了，三下五除二，把来招人的团长给摆平了，他同意接收我。这样我就去了东北建设兵团的一师五团，在五大连池那里。

我到了那儿，先让我住在招待所，然后教小学的数学课。他们都知道我是反革命。海淀区知青办公室送我们过去的老夏跟我说，你可是现行反革命的底子，要积极表现啊。那招待所就在五大连池的边上，大厚墙，热炕。我带的箱子是我家的老箱子，里面装了很多马列书籍，卸的时候感觉特沉。人家还问我，你这装的是炮弹啊？怎么这么沉。其实，我是做好了长期呆在那里的准备。

谁知才四个月，我这个关节因为天冷就疼上了，疼得我在那里呆不下去了。正好老夏又送第二批人到东北来，也住那个招待所里。于是，我就又去找他，开始向他公关。那时候公关不像现在用钱、用各种贿赂手段。我就和他下象棋，靠嘴皮子，用心理战术去磨。果然让他把我又弄回来了。1970年我分配到天桥皮鞋厂下属的一家生产可控硅的工厂。

那段期间，我和刘握中失去联系了，我们也不敢联系了，心想，我们俩都是反革命，就别再挂钩了，让人家借此再整我们就没意思了。

伊林：我们从1968年分手后，就没有来往了。我每次一回北京，派出所、居委会就明确告诉你，你是被监控的对象。所以也不愿惹事。那期间，我在农村苦是很苦的，1973年他还给我寄过白糖。

涤西：1967年清华附中有个姓陈的学生，曾给林彪寄了一份信，批判林彪，但没有公布于众。结果，他也被监狱关了一段时间，后来去插队了。我是通过清华附中的同学认识他的，曾去找过他。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最早就是他告诉我的这事。我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林彪真完蛋了，我马上就联系刘握中。这当中又有个黑色幽默。我给刘握中去了封信，那时候群众的“革命警惕性”高啊！和刘握中在一起插队的还有我们学校其他一些同学，其中一个同学看到是张立才寄来的信，也许是怕我们有什么“反革命活动”吧，就把信给私拆了。打开一看，哎呀，张立才居然说林彪完蛋了，这又是恶毒攻击、反革命行为啊，他马上去检举啦。

伊林：那老兄闹了一个大笑话。他跑到公社检举我们俩反革命死灰复燃，结果那公社干部拿出文件来了，说你看看，是不是林彪已经叛党叛国了？那小子一下子就蒙在那了。

涤西：林彪死了，我又和刘握中接上线了，我们都如释重负。我当时还在学徒呢，他马上让我给他寄东西。他在乡下苦得要命。这也是我一直欠人家的，所以老照顾他。

那时我们还没平反，但已经不算个事了。共产党办事就是稀里糊涂，也不认错，也不给你搞清楚。其实对于林彪，从我个人来讲，我并没有反对他，但也没有想到他是这么个下场。

◇ 未忘忧国再度入狱

涤西：我在工厂里有段时间还挺受重视的，因为我能干活啊，很快就能顶把手用。批林批孔的时候，人家写稿还让我代写、修改。逐渐，我和很多朋友恢复了联系。当时处于极左的氛围中，我的思想算比较右的，还是感觉到压抑，就想发表点意见。

1972年初我和刘握中又合作了一次，写了篇批左的文章，题目是“论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还是他起草，我修改。这次我们用的都是真名。我们认为，中国到时候了，应该从左向右转了，大体就这个意思。我们给《红旗》杂志送去了。稿子当然不可能

登了，反馈回来后，工厂搞政工的又开始盯上我了，老找我的茬。

这期间，北京发生了一件事，以李厚祥为首搞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这小组的人员很多，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反江青的。他想扩大影响，要找一些支点，就找到我了。我那时还在皮鞋厂，和一个同事经常在一起下围棋。这个同事后来就介绍李厚祥来，我们表面上是作为棋友认识的。我们聊了政治形势，都对那种极左状态不满意。其实，公安局早盯上他们这个共产主义小组了，正准备收网呢。后来把他们逮捕了，我也沾了个包。不过，我没参加过他们的任何活动，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所以没逮我。但是，我和他们有联系，再次引起了政工组的注意。

1973年以后，工厂重组，皮鞋厂下面不能搞电子产品，我们那个分厂就并到北京仪表局了。重组以后，政工部门还盯着我，前后盯了我十个月的梢，老想找我的茬。这时正好出了一档子事。一天，我跟同事下班后在配电室下棋。他把电炉子打开了，我看到了但当时没有理会。下完棋后，我们俩一块出去，他回家了，我上了三楼的车间。不久，烟就熏上来了。我才想起来，坏了！刚才电炉子没关。于是，赶紧冲到一层，已经到处是烟了。我看到电炉子把撑东西的木梯子烧着了，起火了。我当机立断冲了进去，把七个电闸都关了。电闸热度很高，我的手被烧得嘎巴了，头发也烧没了。火灾不严重，只是把配电室烧了。大家就送我到医院去了，刚包扎完伤，工厂保卫科就来人监控我了。

一会儿，警察也来了，把我带到宣武公安分局去了。我为人正派啊，主动承担了责任。我们俩从一个屋里走出来，我要是顺带注意一下，就不会引发这个事故了。但不管怎么说，我都是救火的啊。

宣武拘留所的预审员是个很左的人。他上来先审问我给《红旗》杂志投稿的事，我说这是我的观点，而且真名真姓地给党刊投稿，怎么了？然后，又审我跟那个“共产主义小组”的联系。我说我跟他们只是认识，我又没有任何活动，又怎么了？第三件事，他才问我对失火有没有责任。我说我有责任，他记录了，让我签字。我也按了手印。于是，我就等啊，等了有七、八个月了，他们还关着我。到第九个月，他们才再次提审。这回换成宣武法院的法官了，但还是在宣武公安分局审理，一共审了我三次。法院这次不提别的事了，就说失火。他们问我，失火你有没有责任，我说道义上我有责任，法律上我没有任何责任，而且我还有功。在火灾危难时刻，我能拉开七个电闸，使火势没扩大，如果火顺电线跑火，那国家损失就大了。我手烧焦了，头发烧没了，好多人都亲眼看见了。我说，你说这火灾是谁造成的？不是我造成的，我没有任何法律责任。那个同事的父亲是北京市委的老干部，你们不敢抓他，怎么把救火的抓进来了？你们连点良心都没有。我在法庭上说到这儿，一杯热水咣地就泼到我脸上。这就是共产党的法官，一点不知羞耻，都是些官本位的混蛋。几次审讯下来，他们失望了，没法判我。到第十个月把我放了出来。

我被糊里糊涂地抓进去，糊里糊涂地放出来，也没有个说法。后来，我就往宣武分局递申诉材料，这才重新给下了个结论：说我还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但是对于失火还是有一定的责任。因为这不是法律上的结论，你跟他辩解也没有什么意思，他就是要给你留个小尾巴，证明他抓得没错。也幸亏我那位同事，死咬着说电炉子是他开的，我没有动过。他要是稍一改口，我就得被判刑了。

1975年被放出来后，就不能再回原来厂子了，转到了牛街的无线电十二厂。到那以后，每天做重复性简单的劳动，就是给电阻烫棒，这是我最腻味的。于是，我就每天睡会觉，睡起来再干活，就这样我干的活儿都比其他工人多一倍。工人每天应该干八两算及格，我老是一斤六两。厂长、书记来检查，说张立才这小子，我看他光睡觉了，怎么还干了这么多活儿啊？

那个年代，做个非常正派的人走过来，都很难呀。

◇ 我在“四五”当中

伊林：当年，在华国锋之前，用非常手段对付张、江的想法，并不是孤立的。1975年5月间，我在前门大街上碰见白晓宏。我们走到前门城楼下面僻静处，他告诉我：一些将军们对江青、张春桥他们倒行逆施，已是无法忍受。有次军队的会议上，谈起四人帮的某些行为，几个将军气得拍桌子。白晓宏说得激动起来，有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说：“可以采取‘清君侧’的办法。”他说：“先到两位将军家里聊聊再找周荣鑫，看他能不能说通邓小平，邓小平不点头不行。”我说：“恐怕邓小平没有这个实力，面对主席，也没有这个胆量。”约定，秋天他来找我。

5月25日，辞别朋友，乘车往南方长沙，到母亲那儿去。列车中午至汉口，下了车，傍晚，来在武昌桥头。有感，作《念奴娇》词一首。记载：“5月间朋友来，谈及有将军们拍案而起。吾与之商，回湘探母后，与之共事。过武昌桥头，有感，作此词。词曰：

惊雷过后，
望天涯，无数峰岚寂寞，
浊物中流摧砥柱，
两岸清清濯濯。
引月生华，
斜阳下桂，
收满一天色，
凉风帟意，
桥飞惊起鸦落。

神意未到十年，
江山容媚，
雄伟应如旧。
璧玉连城藏画语，
兰艇瑶池归泊。
立字楼台，
环宵舞榭，
翠荫云中路。
晓天素手，
弦歌弹与谁说？

秋天来了，但一直到深秋，没等来白晓宏，却看到了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

1976年春天，中国发生了广大群众悼念周恩来，并以此表达对于毛泽东的不满情绪，对于执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四人帮”则是极为讨厌与反感。4月5日上午，天安门广场国旗右前方聚集着上万人。因为广播了对总理不敬的语言，一辆灰白色宣传警车被愤怒人群把车掀了个底朝天。一名男警官和两名女干警，被倒斜困在有点变形的小汽车内，车门打不开，苦苦哀求围住汽车的群众，放他们出来。当时，呼口号声，此起彼伏，人群的情绪越来越激烈。有人喊，烧死他们！对，烧死他们！有几个学徒工模样的小青年，从衣服口袋里摸出来了火柴。其中一位，距我很近，瘦长的个子，白净的肤色。他打开火柴盒，拈出一根火柴，划了一下，因人群挤动，没有划着。当他正准备划第二次的时候，我迅速伸过手去，按住了他的手。我说，小伙子！不能死人，一烧死警察，他们就有镇压的口实了！那几位小年青听我讲

得有理，就顺从我，把火柴放回了口袋。我招呼大家，把推翻了的汽车，再翻了过来。警察推开车门，出来了。他们那份终于得救后的心情，连连向人群表示感谢的样子，至今有时都还在我脑海中盘旋。一位女干警，她特意向着我表示了感谢，似乎在倒置的车箱内，她听到了窗外的几句对话。我当时下意识里，隐隐约约觉着，你们不应该感谢我，真应该感谢第一监狱的丁所长，那位慈祥的长者给了我真善美的启迪。

约摸过了一、两个小时，纪念碑放花圈的地方，人群突然骚动。人们在追打一位穿深色衣服的男子，指责他说了一些贬损周恩来总理的话。那男子朝西面人民大会堂逃去。人民大会堂东门多层台阶下面，军队用人墙布置了五层阻拦线，士兵们手挽着手。那男子出示了什么证件，士兵抬起手，让这个对总理出口不逊的人，钻了过去。他跑上台阶，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前回头望着。他本来就是从人民大会堂内出来的。群众被拦在广场干瞪眼，过不去。于是人群急了，开始是几千人冲击军队防线，一会儿便增加到几万人。几万人推搡几次，冲击了几次，但是铜墙铁臂，冲不开。那时的民众，经过文化大革命运动，懂得策略。几次冲不动后，大家冷静了下来，做军队的工作，动摇军心：“你爱不爱总理？”“你怎么能保护骂总理的人呢？”军官回答：“我们和你们一样，热爱敬爱的周总理。”这时，我在人群之中，跳起脚举起手，高喊了一句：“人民子弟兵爱人民！”我个子本来就高，嗓门也大，在这一声“首发”的启动下，数万人齐声喊了起来：“人民子弟兵爱人民！”接连喊了两次，类似的口号又有人带头喊，奇迹发生了，士兵们、军官们散开，民众冲上了台阶，民众冲上了人民大会堂。

过了晌午，肚子饿了，就到立才家去吃饭。朝天桥走的路上，不知怎么有个古怪的念头忽然闪到了我的脑海里：今天要是那个学徒工，划着火柴丢了进去，把三个警察活活烧死在警车里，那事情就天大了。按毛爹爹的性格，他拼着最后一口气也会有所作为。他老倒是不会残酷镇压广大群众，倒是会对邓小平采取极端措施了。

过去四、五天，一天下午，街道主任黄大妈走进我家，叫我去顶银胡同居委会，说是有点事。走进居委会，里面三个警察，我以为事发了，要抓人走。有位老警察坐着，手里拿着一个本子和一支笔。他示意两位小警察拿张凳子给我。小警察好凶的，拿张凳子向对面墙边地上一甩，便恶狠狠地对我说：“你老实交待！”老警察，显然是一位领导，他示意两个小警察不要说话。审讯开始，老警察便先告白：“我们是例行公事。你说吧，四月五日那天去没去天安门广场？”文化大革命，练就人们一项本领——当面撒谎，不带脸红的。我立即回答，没去过，没去过，那几天，我天天在家。他又问，你确实没去过？他看了我一眼，好像在示意我：就这么回答。他大实话都说了，“例行公事”嘛。我当然一口咬定没去过。他做了记录，审讯前后加起来也就十多分钟，就结束了。老警察，面容削瘦，但态度温和。两位小警察，都面有红光，却像戏剧里的衙役一样，吆三喝四的，真不知道他俩为哪个主子卖力？我出到院子里，看了他们一眼，心里说你们怎么这么蠢呀。

◇ 第三条道路

淅西：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也到那里贴了诗。大家要发泄嘛，那里是一个发泄的场所，是解压阀，跟北大三角地一样，一个道理。现在这个社会缺的就是解压阀。那时，刘握中已经回北京了，分在北京火车站旁边的那个开关厂工作，住在他姑姑家里。

刘握中初中和李冬民是同学，所以介绍我跟李冬民也认识了。在毛主席刚逝世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实际上写的是第三条道路，预示中国社会变革的前景。那时还没有人敢提这些。当年，我们的《公开信》是全国率先提到大民主、提到普通群众监督党和国家领导人权力这一敏感问题的，被说成是“惊雷”，实际上它具有探索民主程序和体制的意义在内。那时，向阳、红匕首不是说我们右吗，那我就想再往右的方面探索一下，看看向右的这条道是不是能走得通？

我早就看过考斯基、伯恩斯坦、卢森堡的那些理论，他们的思路对不对？这时期我也经常翻阅美国历史，给我震动最大的是它的政治民主手段，在众多管理型态中可以说是最优秀的管理型态，是符合人民最大利益的。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刘握中看了文章后，就把李冬民领来了，非要我的这篇文章。我说，我这文章没署名，不希望传给别人看。你看完后要还回来。

1978年，李冬民很欣赏“第三条道路宣言”这篇文章，他把它在北京的青年人中广泛传阅，这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第一条道路指的是毛泽东左的路线；第二条道路是指刘、邓温和的路线，但是他们不主张政治体制的改革；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全面的，即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必须以政治改革为前提。我没有引用马恩的理论，当然也不能引用考斯基的话，是用自己朴素的语言分析和阐述。文章正标题是“目前形势分析和几点估计”，副标题为：第三条道路宣言。

文章通过大量分析，提出几点估计，最后提出一种思想，引出一个趋向来，很清晰地阐述了第三条道路。文章都是从正面说的，这样抓不着什么把柄。我也支持邓小平，希望邓小平按这个路线前进，因为他是可以代表民意的人物。当时我也比较成熟了，布朗基主义早就扔到一边了，反过来研究一下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是有意义的。社会民主党推崇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如果通过议会斗争社会主义能够和平长入资本主义，那是件很好的事。这点我喜欢，符合我的性格特点。刘握中大概属于激进自由主义者，我大概属于理性自由主义者，这也就是我俩的不同之处。

李冬民事件的起点就是从第三条道路开始的，他们到我家里来，一起开过五次会，探讨这个问题。李冬民把这篇文章也传给他那些核心人物看了，然后在一起探讨。在原清华附中“井冈山”组织负责人刘刚家也探讨了一次。这些人中有偏左的，李冬民、刘刚是偏左的。我们被定性为右派，钟加仑那一伙也是典型的右派，钟当初因为反林彪，在军队被判了二十年徒刑，还差点把他杀了。这些组织工作都是李冬民做的。后来有一次开会，决定要公开上街刷大标语，钟加仑他们提议要把重点放在打击刘传新上。刘传新当时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是镇压“四五事件”的刽子手之一，要写就写这个。大家对要求平反天安门事件没有不同意见。然后，讨论提出平反“四五”运动的方案，标语内容是明确的：“必须给四五运动平反”、“刘传新必须为血腥镇压负法律责任”。那时候我们就提出了法律的概念。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最后，争议的焦点落在呼吁恢复邓小平职务和领导中央工作的问题上。拥邓的问题是我发起提出来的。第三条道路提出民主改革，这谁都欢迎，年轻人有共同的趋向，希望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民主，这毫无疑问。但对政治民主改革这点有异议，分歧就在拥邓这个问题上。李冬民开始处于犹豫状态，他说不能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这是一个理由，但现在中国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高度集中指导下的政治体制，如果这个体制内出现能够推行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那也是件好事。做一个自下而上的群众性呼吁，要推出一个代表民意的人物。从这点来讲，邓还是能起很大的作用的，历史学家也会认可这点的。我们就反复做李冬民的工作，他也不坚持，最后大家统一了。大标语就贴出了“坚决拥护邓小平恢复中央领导工作”等口号。现在看，冬民的意见是对的。

◇ 走在历史的前沿

1977年1月8号，我们在天安门前贴标语条幅。当时是我和刘握中去刷的标语，大标语是我的手笔。这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啊。写标语的房间是李冬民安排的，并准备了书写工具及纸张。钟加仑是部队的，他派了两个战士，提了四桶浆糊，自行车后面放一个杠子，一边挂一桶。他自己开一辆无牌照的汽车，开到前门那儿的广场上，刷完后就赶快上车走了。我和刘握中从天安门一直贴到王府井的海洋局那里，能贴的地方都贴上了。景山三座门总参那里我

没去，刘握中去了。

文革十年，北京的中学生在很多地方超越了大学生。文革初期不说了，这时毕竟是我们这些中学生首先把恢复邓小平职务、给四五平反的大标语贴到了天安门。不管事后说，我只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功劳也好，但我们毕竟是做了这件事了。说白了，这是一种历史的担当。我当时也想到可能会再进监狱，但总是有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两个凡是”的厌恶，因为它阻碍社会的进步，不把这个结解开中国怎么前进？现在又有一个结，不管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多大经济成就，但三十年来对文革体制还不调整、不修正？该修正地方太多了，经济自由主义泛滥，引发腐败；民主文化的沉沦，其毁坏不亚于文化革命啊。这都需要理性的回归。现在哪个利益集团能够放下自己的利益，推动全面的改革？

很快，在北京市委吴德等人汇报后，华国锋下令把李冬民等人下狱，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罪名之一居然是要抢军火救王洪文，简直风马牛不相及，真敢编呀！李冬民被抓后，我和刘握中都没被抓进监狱，这一次又是群众专政，关了我七个月。我的关键问题还是第三条道路，吴德认为这是个把柄，在审查我的时候就说，你是李冬民集团的骨干、理论家。后来，丁国钰派来的工作组撤了，才放了我。当然，还是糊里糊涂地放的，什么也没说。我现在走路一瘸一拐的，这个腿病就是那时候关在地下室弄的，浑身起那红疙瘩，大骨节病关节炎，摧残人的身心啊。到现在也没人管。

伊林：我和李冬民是初中同学，原来不熟悉。后来联系上，谈得很投机。约在1976年11月下旬。我向他建言，提出发动首都的民众，公开呼吁两条要求：一是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要求中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要说渊源，应是来自10年前，向阳、红匕首挑明的那一句话：“你们要知道，你们实际上是站到了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也是10年前秋日，李文博、乔兼武“新思潮”的民主自由启蒙。

对于第一条，冬民当时就认为可行；对于第二条为邓小平出来恢复工作呼吁，他说让他考虑一下。冬民做事很有条理，过了两天的一个晚上，冬民到南纬路的立才家，我们在等他。他说，第二条，呼吁要求邓小平出来恢复工作，可行。我们三人讨论到11点多，冬民才走。我们认为，今年“四五”时，希望变革的上下各阶层群众本来就同情和支持邓小平，现在呼吁邓小平出来恢复工作有广大群众运动的基础。如果成功了，也就将“四五”群众运动的民主作用显现出来了。华国锋、汪东兴他们，若没有“四五”时期各阶层广泛的民意基础支持，他们是不敢发动部队逮捕“四人帮”的，华不敢下这个决心。所以应当看清，“四五”运动在历史上的效应。

第一条要求为“四·五”天安门广大群众运动平反与第二条要求邓小平出来恢复工作，两条内容是密切相关的，相辅相成。立才拿出来毛泽东主席去世之际写成的《第三条路线宣言》，该文很有新意。我接过来，交给了冬民，要他看一看。《第三条路线宣言》认为，中国应立即同时开展民主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既不能走文化革命的路，也不能走文革前十七年的老路。冬民觉得好，带走给其他同仁。这样，立才《第三条路线宣言》就传开了，成为“李冬民事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准确点说，这是“李冬民事件”的主要理论基础。

我们在1977年1月7日夜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冬民提出第二天公开贴标语时，应有一张批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的标语，被钟加仑否定了。到现在，我还非常佩服钟加仑，他提议将吴德的标语，置换成“公安局长刘传新应对天安门流血事件负法律责任”的标语。钟加仑改定的这条标语对后人有着法律警示作用。标语贴在天安门下观礼台上，以后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自杀了。

“李冬民事件”并非遵循那种“不破不立”哲学，没有一点反对华国锋、吴德的意思，只是呼吁让邓小平出来恢复工作，没有“破”，只有“立”。但这不知刺激了华国锋、吴德哪根神经，后来他们自己闹到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亲自指示逮捕李冬民等人。据说为此事，全国各地抓捕关押了400多人。

历史是严肃的，但有时却会跟你开玩笑，而且玩笑会开得让你很难过。1989年6月4日，我又在天安门广场。我午夜过后往天安门广场走。天桥方向，子弹的弹道不停地划破夜空。广场的南半部，上万手无寸铁青年学子们，平静地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广场的北半部，浓烟滚滚灯光暗淡，天安门城楼已看不清，下面东西两厢全是黑压压的军队，军队方阵前面是一辆燃烧着的装甲车还是汽车，火光比灯光还亮。我站在国旗的旗杆旁边，孤零零的，我自己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就那么久久地伫立在那儿……

◇ 自己写的平反结论

涤西：我被放出来，厂子就对我好一些了。工厂有一千多台旧电动机要更新，要花三十万买。厂里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修好了其中的八百台，省了一大笔钱。厂长立刻对我刮目相待，正好机加工的划线钳工要退休，他就让我顶上去，对我说，现在缺一个划线钳工，你试着来吧。划线工是高级钳工。我就跟那个老钳工说，我没干过，你得传授我两天啊，他说行。可他第二天就走了。我想坏了，这活儿干不好别又成反革命了，因我一个人造成停产，责任重大。我当夜就找我叔叔去了。他是高级技工，马上给我解释这程序。学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上阵了，一个零件都没出问题，没出过一次差错。就这样，在划线钳工这个岗位上干了两年左右吧。

刘握中是1978年考上了大学，到人民大学上学去了。我是被耽误了，没能去考大学。大概是1979年我给胡耀邦写了封信，是关于伊林、涤西的平反问题，直接寄到中央组织部。很快，北京市公安局就来了一个处级干部，岁数挺大的。他说，我给你平反来了，结论你可以自己写，我们给你打印、盖章。我说，那不行，当初是公开给我打成反革命的，我现在也要公开平反。这个结论，我可以自己写。

那时刘握中还在上大学呢，我跑去找他。我说咱们的平反结论是一样的，要自己写。刘握中说，那你写吧，我上学呢。我说现在探讨的是要公开平反的问题，看能不能同意。我自己写完了结论，交给公安局这个处长。他挺鬼的，打印出来以后，他直接发给仪表局政工科了，没有搞公开平反。不过，他还是把意见反映上去了。

之后，徐明河——一位新华社的老编辑，找我来了。他约我给《瞭望》杂志写一篇关于伊林、涤西的历史回忆。我也不能把自己说成是反林彪的英雄吧？我写得还是比较温和。之后，他帮我发表了，署名是张立才。这是很高的荣誉了，说明各方面开始重视你了。工厂认为《瞭望》是党刊，各党支部都订阅。这样厂里都知道了，全厂都嚷嚷开了。书记找我说，党刊开始登你的文章了，全厂都轰动了，你还是很正确的。你得入党啊！后来，徐明河又告诉我，可以录取你到新华社工作，这是上面的意思。我把表都填了，但最后没去成。据说，名额让高干子弟给顶了。后来，我到仪表局的职工学校教了一段语文，就到万润南的四通公司工作了，兼任四通太原公司的总经理。

胡耀邦逝世的时候，我从心底感到对耀邦同志的尊敬，就从太原给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发了一份电报。我写得比较猛，提到胡耀邦是辛亥革命以来最伟大、开明的政治家，是超党派的伟人，君子坦荡荡等，写得很漂亮。发了电报以后，我找到徐明河，问他认不认识胡德平？他说认识。于是，我弄了两个最好的鲜花花圈，一人多高，那时八百块钱一个，又找了一辆大的

面包车，由徐明河带着我们去胡耀邦家了。耀邦夫人李昭跟胡德平出来接待我们的。我们把花圈摆到灵堂那里，一看周围，就这两个花圈是鲜花的，其他都是纸花的。那时候，感情上来了，我哭得眼泪哗哗的。

我这辈子总是在搞自下而上的草根政治，坎坎坷坷，三次被抓、两次入狱。所以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女朋友，直到36岁才结的婚。当然，这过程里面戏曲性的插曲也很多。但是因为走上了这条道，也就是说有一股惯性，就必须往前走。我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可能还要继续往前走，对我而言，这是一条至死不渝的道路。

◇ “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伊林：我是1978年上的中国人民大学，大学毕业后，被强行分配到湖南的一家农业银行工作，后来我自己调到了深圳。我是1984年结的婚，爱人是老八路的后代，老丈人是山东人，是随“四野”南下到湖南的干部，他老人家打仗很英勇、很有能力，但也是挨整的。岳父文革前是湖南省政府的局长，当地干部整南下干部，结果他在文革前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时给判了十年刑。我这个国民党的后代挨整，找个共产党的后代也挨整。

两岸交流以后，我父亲到了大陆，我就跟着我父亲他们混，帮他管理公司。结果，台湾的老板间打架，最后公司垮了，我也失业了。

像我这样的人，在国共两边都不受待见，是那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人。共产党说你是残渣余孽，没给个好；国民党又认为你被洗脑，有共党嫌疑，甚至我父亲死时都没批准我去台湾吊唁。那才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所以，当我看到国民党跟共产党再次握手的时候，真是百感交集。

现在，我已经办了退休手续。暮临回首少年狂，对当年写这封《公开信》，我没什么后悔的，也谈不上后悔。这是文革当年的那种思潮把我裹进去了。当时要找一个现实的目标来实现大民主，就找到了林副主席，写出了“对不起……，请靠边站……”，才演出了这一场人生悲喜剧。谈到为“四五”平反，呼吁老邓重新工作，我也只是尽到了一个公民的历史担当，余下的让历史学家们去评说吧。有句话说得好：让历史朝向未来。

注释：

- (1) 鸽子中的稀有品种。
- (2) 北京儿童玩的一种火柴盒大小的硬纸画。
- (3) 指关系密切。
- (4) 北军指北洋军阀的军队。南军指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军。
- (5) 湖南方言，音 aijie，祖母或年老的妇女。
- (6) 湖南方言，音 diadia，祖父的意思。
- (7) 北京方言，意不被重视、不得好处的。
- (8) 时为清华大学学生，后为四通公司董事长。

□ 原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

【研究述评】

“两个文革”说：权力斗争还是社会冲突？

• 徐友渔 •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近代史研讨会”上的发言，经作者审订。）

我今天不是泛谈文化大革命，而是谈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叫做“两个文革”说，我本来是给大会提交了一个详细的提纲，结果没有打印出来。

我首先要说什么叫做“两个文革”说，所谓“两个文革”说，就是这么一种主张，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只有毛泽东发动的那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官方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的文革，那个文革是毛泽东为了贯彻自己所谓的革命路线或者要打倒他的政治对手刘少奇，这个是大家都经历过的文革，大家概念中就有这么一个文革。“两个文革”说主张，除了这么一个文革，还有一个“人民的文革”，这个文革是中国人民趁毛主席要搞大民主、大字报、大辩论，趁着这种社会控制松懈的情况下起来斗争，争取自己的利益，打倒特权阶层，有这么一个文革，这个文革是意义重大的文革，而关于这个文革的说法对现在很有影响。

“两个文革”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两个文革”说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文革研究在中国是一个禁区，所以大家对于文革研究的情况不是太了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刚一爆发——我们一般定义为1966年5月16日爆发——不久以后，西方的研究刊物《中国季刊》、《亚洲概览》、《共产主义问题》，以及美国的兰德智库，基本从6月份开始就跟进了，并且从1967年开始出版有关文化大革命专门的著作。在西方有一个完整的文革学，它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有经典文献，有主要的著作，现在已经有大学的教科书，研究中有重要的代表人物。这是在西方，但是在中国是怎么一个局面呢？有句话叫做“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西方，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国外”，国外形成了流派，有很多权威的学者和研究者，但这些情况对中国是没有影响的。当然，最后这个情况是改变了，大概可以说从十几年之前，大约在上世纪末，由于很多中国学者的努力，中国人研究文革有了很大的成果，现在已经不能说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西方，我觉得中国人最终还是比较争气，文革学的主流力量现在也应该是在中国学者这里了。

在文革研究有林林总总那么多文献、那么多观点、那么多流派的情况之下，我根据自己的研究，认为“两个文革”说可能是文革研究中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学说，是吸引讨论、研究、争论的人数最多，观点最多，争论最激烈、最集中，而且最长期的一个学说。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可以和这个问题相提并论。我甚至觉得第二个问题的研究理论成果还不如这一个，所以，“两个文革”说应该是文化大革命研究里最重要的话题，或者是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这是第一点。但我今天除了谈理论之外，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两个文革”说在现在的中国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为什么呢？大概可以这么说，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对于文革的否定可能是达到了最高潮，那些想说文革好话的人是最没有市场的时候。但是随着90年代这种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起来以后，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贪污腐败情况越来越严重，对文革说好话的思潮就越来越升温，我觉得到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你看那些“乌有之乡”的网站，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毛泽东热”也是一浪高过一浪，毛泽东关于“继续革命”的思想、关于打倒特权的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打起的“社会公正”的旗帜，现在对中国很多人有极大的吸引力。

在这种情况下，文革的很多说法是越来越有吸引力了。中国现在并不是开放和自由的社会，中国的大部分老百姓对于处理社会不公正问题，对于变革中国社会是没有太多的想法的，没有外面的信息和借鉴，但是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深入人心，所以他们在看待中国社会不公正问题上，看待这种贪污腐败特权问题上，看待未来中国应该怎么变革的问题上，他们受文革的影响超过所有的西方理论，在中国最广大的民众中，如果从数量上来说，最深入

人心的，人们最习惯的思维方式还是文革的思维方式。他们在考虑自己行为的时候，文革的行为模式，比如“打倒贪官污吏、走资派”，“大民主”等等方式，这些东西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而这些东西最相关的就是跟“两个文革”说有很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了解这个学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文革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幽灵，而是现实生活中影响甚至支配人们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的一些重要的理论资源了。我觉得，了解文化大革命对现在的影响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现在介绍一下“两个文革”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据我自己的研究，最早提出“两个文革说”这个概念的人是王希哲，中国人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是他写的，写得非常尖锐，我甚至认为是非常深刻的，他1981年发表的那篇文章叫做“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他在这篇重要的论文里提出，与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相对的有一个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他说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间，伴随着毛泽东的每一步胜利，都是人民对他的认识的进一步的加深和抵抗的进一步的加强。经过1966—1971年的感性的认识和积累，又经过了1971—1975年的比较理性的认识的积累，终于在1976年4月3日爆发了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

所以我考证的结果就是，最早的是王希哲在1981年《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这篇论文里提出两个文革的学说，首次提出有一个人民的文革，跟毛泽东想打倒政敌的文革是相对立的。我介绍一下王希哲这个人，1974年的时候，文化革命的异端思潮里最重要的一篇大字报叫做《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就是广东三个人写的叫做“李一哲大字报”，李一哲是三个作者每个人用自己名字的一个字，“李”就是李正天，后来是广东美院的教授，“一”是陈一阳，是一个干部，广东省电台的干部，“哲”就是王希哲。我研究文革专门采访过这几个作者，我后来看了一下，我经过仔细研究，觉得那篇大字报可能主要的执笔人是王希哲，他有很强的理论思考能力。那时候还是赵紫阳在广东执政，他们的这套东西是非常深刻的，和文革中其他异端思潮不一样，在当时就明确提出了民主与法制问题，他们借口批判林彪，实际上批判的是毛泽东思想，批判的是整个文化大革命。当初有一个很有意思奇怪的情况，毛泽东主张不杀他们，要批他们，赵紫阳在批他们的时候方法很不一般，以前批就是把你斗一通、骂一通，但是那时候举行了一百多场大辩论，让他们自由发言，自由准备，把他们的大字报印了几十万份到处散发，这就客观上造成了一个效果，使他们的观点成为传播得最透彻的一种思想。这几个家伙水平特别高，每次辩论，当初请的人是广东理论水平最高的人，一批批地换，上去被这些人引经据典施展马列主义水平，每次打得落荒而逃。虽然他们最后还是被判刑了，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官方正式给他们平反，而且他们写的东西得到了肯定。那时候习仲勋也在广东主政，对他们是比较温和的，想把他们收编到体制内，结果他们中有人也就被收编了，但是王希哲就一直坚持在体制外，现在是海外民运里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还写了一本自传叫做《走向黑暗》，我今天当然不是讲这个，但是我看了这本书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还是想说一说，他后来从事民运活动，尤其跟“天安门事件”、“民主墙”搅合在一起，就被判刑，一次十来年，他第二次服刑已达十一年年的时候，在1991年，在监狱里，当他听到官方的广播，当他知道克里姆林宫的红旗降下的时候，他想到自己的理想，过去的理想和现在的理想，那为了社会主义走到了这么一条路，他潸然泪下。

所以他提出这种“人民的文革”，这点我觉得还是有深度的。

郑义在1996年关于讨论“两个文革”的文章说中，不把“两个文革”说像我这样归结到王希哲，他说，实际上是刘国凯在《文化革命简析》里提出了“两个文革”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刘国凯是一个工人，上世纪70年代初还是一个广东省一个工厂的小青工，他

居然就写了一本将近十万字的著作叫做《文化革命简析》，我觉得是一个奇迹。我当初是在国外，90年代的时候，研究文革时看到英文文献，看到外国学者给他翻译出来了，我是先看到英文的文本，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里找到了比较原始的油印文本，这个文本非常珍贵，但是后来丢了。刘国凯才是十几岁年的青工，居然写了一本著作就叫《文化革命简析》，郑义说“两个文革说”和“人民的文革说”是在刘国凯这本东西里提到的，但是我仔细看过，我觉得他有这种思想的萌芽，但是不像王希哲正式提出两个文革和人民的文革，刘国凯后来移居到美国，现在在美国开大卡车送货，他是自己发起成立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副主席，现在跟王希哲打得一塌糊涂。有人对他进行了很高的评价，说刘国凯这种人是真正的劳动人民政党的创始人，因为一般都是知识分子自己封自己是代表了无产阶级，刘国凯本人是体力劳动者，是开大卡车为生的。在美国，一般人中国人是要去争钱，争基金会资助，只有一点钱，大家都要去争，打个头破血流，他靠自己养活自己，从来都不搅和这件事，他就是靠自己辛勤的劳动，开大卡车挣钱。但是现在在政治主张方面也闹得一塌糊涂。

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两个文革”说是脱胎于另外一个文革中最重要的理论叫做“社会冲突论”。文革研究的分期和发展大概可以这么说，一开始从1966年爆发文革的时候，西方的文革研究者主要研究两个问题，研究文革革命一些重大事件，哪个地方的省委书记被打倒了，省军区司令员被换了，还有就是研究权力斗争，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争论到底是权力斗争还是路线斗争。而中国大陆的人想研究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另外一种角度，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怎么上当受骗的，我们怎么当初有个很好的社会理想，觉得这个社会理想可以寄托到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上去，最后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整个西方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大概从70年代起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成果，就是它完全不研究这种问题，它觉得对于研究文化大革命来说，权力斗争、路线斗争，或者我们的革命理想怎么上当受骗这些东西不那么重要，整个西方文化大革命研究迅速地从路线斗争、权力斗争，以及理想转到社会问题，他们觉得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社会冲突，就是有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社会阶级和阶层的人，他们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革命胜利之后，广大人民逐渐变成是受压制的群体，这跟德热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的观点如出一辙，受压制的群众为了打倒官僚特权阶层，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争取自己的利益。文化大革命出现了大量的派系，并不是只有一派，都是盲目的上当受骗拥护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其实最重大的内容就是各种派别在斗争，如果大家都忠于毛主席，大家都上当受骗，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派别斗争，千军万马地互相在进行生死搏斗。实际上不同的派别是在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队伍的人员成分是不一样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跟中央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跟领导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就这样的视角叫做社会冲突论。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研究中做得最好的就是社会冲突论，这有很多人在做，这些人都是外国人，只不过他们都有中文名字，比如李洪永（韩国人，Hong Yong Lee），陈佩华（澳大利亚人，Anita Chen）等等，他们这种社会冲突论的基本主张是什么呢？就是说研究文化大革命不应该集中于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者是路线斗争，不应该只是考虑他们的政策分歧，还应该研究文化大革命中上亿人的群众是文化革命的主体，要研究上亿群众的思想行为，他们之间的无休无止的甚至刺刀见红的派系斗争，这种斗争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内部的社会矛盾。

而在中国人里，那个时代研究文革最著名的一个代表人物首先就是杨小凯，就是杨曦光，还有就是郑义、刘国凯、王绍光这些人，王绍光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的主任。杨曦光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他是“两个文革说”和社会冲突论的中国方面最重要的一个代表，他后来被公认为是中国人里最有可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人。他的经历也非常传奇，他父亲文革前是湖南省委的秘书长，本来是个老革命，后来受彭德怀、张闻天庐山会议的影响，没有把他打成“彭德怀分子”，但是右倾，定了党内有处分的人，他是属于高干里不是很受重用但是也身居高位的人，杨小凯自己也是很深地卷入文化大革命中去了，文革中还做了很多社会调查。杨小凯在文化大革命中就非常著名，因为他就相当于写《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一样，他在1968

年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对中国的各个阶层进行分析，对中国的未来社会应该怎么变革有很多说法，他也因为这篇东西被打成反革命，被关在监狱里。他是一个高二的学生，但是他是非常运气的，他在监牢里关了十年，等于上了十年中国最好的大学，中国的大学那时候完全停办，对一般人来说是荒废了十年，实际上是荒废了十二年，但是杨小凯得天独厚，他本身是政治犯，关在政治犯监牢里，当初湖南最有学问、最有思想的人都在里面，他在里面学英语、学数学、学机械，学得很好。所以当他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非常有知识的人了，后来社科院把他招考进来了，最后到美国留学，很快就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后来大家认为最大的损失就是，他如果多活几年可能就得诺贝尔奖了。他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时候，那个学校的人就把他当成是将要得诺贝尔奖的一个人来待遇，给他的地位、经费非常高。

他威信非常高，写了很多东西，最重要的就是文化革命中由此被判刑的《中国向何处去？》，他后来也一直研究文化革命，出版了一本很好的书叫做《牛鬼蛇神录》，讲他在文化革命十年，在监狱里学习的情况，学英语、学数学、学物理，什么都学。关于社会冲突论，杨曦光在一系列论文里说，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一般自觉或不自觉的使用的理论框架有三种，一种叫做权力斗争说，用中共领导人物争夺政治权力为主线来分析文化革命——西方这方面说法最多，我觉得大陆一般不好意思赤裸裸地这么说，因为我们对于伟大领袖都是照着官方说的，我们不能说毛泽东和刘少奇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其实大家有这种看法，但是变成一种学说的不多——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文化大革命，我觉得西方学者是最多的，他们认为，说文化是胡扯，根本没有文化这回事，文化革命中根本没涉及到文化，要说“武化革命”还有可能，因为都是用机枪坦克在打仗。但是你要说是“文化”革命，根本是毛泽东的遮羞布，这种理论着力于分析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是怎么回事。杨曦光总结文化革命的理论分析有三种，第一种是权力斗争说，第二种是中国官方的阶级斗争说或者路线斗争说，或者两个司令部的说法，这是文化革命中官方的一种说法，比方毛泽东、江青这种文革派都是采取这种说法，说文化革命之所以爆发是有修正主义路线和革命路线之间在进行斗争，是路线斗争的说法。而文革之后的邓小平、陈云也采取了路线斗争的说法，只不过在对错问题上刚好颠倒，文化革命时候毛主席代表的革命路线，防修反修，刘少奇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总之来说，文化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是路线不一样，有路线斗争。而后来否定文革的邓小平这一派也是同意是路线斗争说，只不过正确的路线是刘少奇的路线。这种说法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也成立，比方现在说的新民主主义，刘少奇要坚持新民主主义，毛泽东不满意，他背信弃义，把自己庄严的承诺——即要搞新民主主义——背叛了，走另外一条极左的路线，过早地搞社会主义革命。这也是路线斗争说，只不过以前文化革命正确的一方变成了错误的一方，文化革命受批判的错误的一方变成了正确的一方，这就是文化革命的第二种理论框架，叫做路线斗争说。

最后一种说法就是杨小凯为代表的，在中国人里面有人提出，当然更重要的是那些西方学者最早提出来的，叫做社会冲突说，杨小凯总结说，最后这种观点是这么认为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上层的权力斗争，也是中国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阶层的斗争，卷入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和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并不简单的是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从事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并不仅仅是上当受骗，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他们利用文化革命中暂时的大民主的机会来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文化革命中群众的利益集中地表现在造反派的政治纲领里面，他们是要打倒官僚特权阶层，而另外一派保守派是要维护现存的利益，就是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双方的斗争构成了文化革命中群众斗争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文化革命整个经历中最重大的内容。这就是社会冲突论。

其实比杨小凯最早更正式提出这种理论的是一个专门研究文革的学者——杨小凯算是业余研究文革的，他主要研究经济，那个人叫陈佩华，是中国血统，所以她研究起来比较方便，叫做 Anita Chen，陈佩华说，1966—1969年的文革是反官僚运动（这种观点现在在中国老百姓里面非常有市场），她说文化革命刚开始的时候，那些造反派就被毛泽东提出的口号

和理想所鼓动了，毛泽东说我们要解放群众，我们要尊重群众，我们有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就是群众路线，刘少奇的路线是国民党的训政路线，把群众当阿斗，把自己当诸葛亮。造反派当初是受了这些东西影响，就积极参加到文化革命中间去。如果说他们在头几年是被中央文革操纵，是拥护毛主席的话，他们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把自己发展成为一支有独立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计划的力量。而杨小凯就说得更过分（我是非常不同意的），他把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说成是准政党，他不好说是政党，但是是准政党。他把毛说的动员群众的手法叫做“毛打自由结社的牌”，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说得过分了一点。照杨小凯的说法，1966—1969年毛泽东为了要打倒刘少奇，玩的是自由结社和言论自由的牌，那时候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历史上罕见的、例外的有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时期，那时候办小报，发表什么言论是没人检查，可以发表的，说结社自由，人民群众是可以成立组织的。但是我很不同意杨小凯的观点，他夸大了，实际上有限制和规定，比如有一个《公安六条》，规定任何言论若是攻击毛主席、林彪的，群众马上应该扭送到无产阶级专政机关里面去。所以我觉得杨小凯有点过头，但是他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根据，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种说法就使得现在很多人把文化革命想成是人民群众罕见地享受大民主和自由的黄金时代。杨小凯就是用现代政治学的术语来说那时候实际上有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杨小凯断言文化革命中积极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对共产党的统治不满意的人，他说1966—1968年中，有两年时间，毛泽东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军队以外，所有的共产党的组织活动都要停止，允许市民只要经过向政府注册就可以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毛主席是利用一般民众对共产党体制的不满，利用刘少奇、邓小平对市民进行政治迫害（指派工作组等）激起的民愤发动了造反运动。他说那时候的运动是一场真正的造反，中国共产党的官僚在十七年来所做的事情都受到了民众的清算，在当时的中国，在1966—1968年，这两三年时间里，在那时候的中国有真正的工人运动，有真正的学生运动，有真正的市民运动，表面上大家是听毛主席的话，是搞革命造反，但这场运动的实质是极右的。为什么是极右的？表面是跟随毛主席在造反，实际进攻的是党的组织，他们想改变的是党的领导，在这种意义上，造反运动的实质是极右的。有一个人说得更厉害，跟杨小凯差不多，法国有一个研究文化革命的，叫华林山，他后来加入了法国国籍，娶了法国人老婆，他是当初广东最著名的红旗派的一个造反派成员， he 就说实际上文化革命造反派就是想推翻中国共产党。我非常不同意他这个说法，我跟他进行论战，而且我认为我把他批得非常厉害。至少这种说法，我觉得是非常蛊惑人心的，但同时用我比较学术上的语言来说，还是有部分的事实根据，海外相信这种理论的人还是挺多的。我觉得他们这种说法不是完全无中生有，就是把那种程度和规模怎么考虑的问题，他们的说法有些事实根据。

另外有一个立场很正统、官方的人，现在一般把他叫做新左派的人，叫做王绍光，他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做的论文就是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他的博士论文中文版和英文版都出了。他是一个社会冲突论非常重要的代表，他是在学理上来论证为什么说文化革命是一场社会冲突论而不是大家上当受骗，只是心甘情愿地拥护毛主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进行文化革命。他从那么一个角度来论证，他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可以证明文化革命中群众的组织是有自主性的，不是只听毛主席的，这个证据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他就引证了毛泽东很多话，毛主席刚开始说文化革命搞三个月，搞了三个月以后，他说文化革命看起来要搞六个月，搞了六个月以后又说文化革命看起来要搞两三年，搞了两三年以后，毛泽东说文化革命还要搞下去，结果搞了十年都没有搞完。王绍光就根据这么一个论断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的日程表一次又一次地作废，一次又一次被打断，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不是毛泽东掌握、控制了文化革命的进程，毛泽东根本控制不了，而是文化革命的进程推着毛泽东在走，毛泽东是被群众运动卷起的浪潮搞得团团转，不是毛在领导文化革命，不是像我们认为的，毛对文化革命是收放自如的，是他能够彻底控制的，实际上毛是在跟着运动后面走，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说两个月不行又六个月，六个月不行又两三年，两三年不行到了十年也在搞，群众运动这种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之后，毛泽东也收拾不住了，所以毛泽东是处在团团转的状况。所以王绍光说，这种事情充分说明了不是他所发动的文化革命受制于他，而是他受制于他所发动的运动，他本人成了

文革的最大牺牲品。这就是王绍光的观点。

这种“两个文革”的说法是讨论最集中和最长期的问题，这种讨论到了文化革命三十周年，1996年的时候，关于“两个文革说”的争论就成为那一年纪念文化革命发动三十年很重要的题目。到了2006年纪念文化革命发动四十周年的时候又成为一个最重要的题目。刘国凯在2006年文革周年纪念会上又写了一篇很重要的论文叫做《论人民的文革——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他在其中说，毛泽东搞文化革命是手段，目的是清洗中央，清洗省市跟他意见不同的人，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的官方文革的第一个说法叫做文革清洗，毛泽东要清洗刘少奇为首的这些人。在文化革命中还发生了军队和掌权的文官对革命群众的极其残酷的镇压，在这种意义上，官方文革除了文革清洗以外还有一个内容叫做文革镇压。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要反对政治歧视，反对政治迫害，有一个群众要争取自己生存权利的运动，叫做文革反抗，文革反抗就是“人民文革”方面的内容。这种观点在09年发表的时候，大陆也有人回应。有个学者叫刘自力，据说他是中宣部干部的子弟，理论思考非常多，现在发表很多文章，他就反对这种观点。在“两个文革说”方面，与对于文革中造反派的认知和评价有关，有一个重要的也是极端的观点，认为文革中的造反派代表正义的力量，因为人民群众受到了欺压，他们在文革前的十七年被官僚阶级、特权阶层所压迫，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他们是利用文化革命的机会出来反抗特权，反抗官僚，在这个问题上，“两个文革说”涉及了对造反派的评价。在这方面，刚好在2006年出了一本书，是四川省的周伦佐写的，叫做《文革造反派真相》，就是说，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被邓小平称为“三种人”，被说成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不怀好心干坏事”的人，他说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很正派的人，他们是受欺压的人，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有很多这种说法。

我最后再说两点来。第一点，我自己也有观点，我自己也参加了这场争论，是一种观点的代表，当初我是比较持否定“两个文革说”立场的，我感觉到秦晖对我的观点不是太以为然，秦晖的观点没有“两个文革”说那么明确，有一点倾向于对“人民文革”说，我自己研究文革研究得很详细，我知道他们说的那些东西，但是我认为没有毛泽东的文革就没有后面的造反派活动的空间，在这种意义上“人民的文革”基本上是毛泽东文革一个派生物，一个副产品。我作为一个学者研究，认为从统计的意义上，从涉及的人数上说，它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你把“两个文革说”的理论所说的那些自觉不自觉的真正要反官僚、反特权的人，与我们谈到文革的另外一个故事——我们讲文化革命的红卫兵运动就是“五大领袖”，讲当初的血统论，讲蒯大富这些人——涉及到的人，相比而言，人数和力量就太少、太小，我觉得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意义上我就不同意“两个文革说”。但是随着现在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剧烈，我觉得“两个文革说”，关于文化革命的造反派的理论、思想观点和情绪，在潜伏了三四十年之后，现在在中国这种社会里这种社会矛盾急剧发酵的情况下，我观点渐渐向秦晖靠拢了一点，我觉得在统计意义上，数量太小，它不能与第一个文革相提并论，但是它的意义现在越来越明显。所以现在我的观点稍微靠近“两个文革”说一点，但是我基本还是同意“一个文革”说。

这方面的观点还有很多，比如重庆有一个何蜀，他是重庆党史杂志的主编，他的观点跟我大致一样，觉得造反派就是上当受骗，他甚至认为造反派在文化革命中只知道搞打砸抢。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回到这一点，大家可能还是感兴趣在这一点，实际上现在随着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对现在、对当代影响反映出来是越来越深了，毛主席提出的人民群众、革命群众“造反有理”，提出了“打倒走资派”，提出了应该有大民主的这些理论，当初提出时，中国革命搞得那么左，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市场经济影儿都没有，显得有些牵强附会，后来中国搞了市场经济，有那么多贪官污吏，现在说成是“走资派”，大家觉得越来越有道理，甚至比毛泽东当年搞文化革命时宣传的还有道理。毛泽东当时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这显得有些荒谬，资产阶级怎么在无产阶

级先锋队里？大家觉得这个很荒谬，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说法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和英明，现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特权阶层，贪污腐化，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现在搞的是市场经济。我觉得情况是这样的，在80年代的时候毛泽东这套理论没有人信，陈云和邓小平否定文革的说法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后来特权阶层越来越严重，特殊利益集团越来越严重，尤其搞了市场经济以后，“走资派”这个概念的似乎合理性越来越凸显，荒谬性越来越淡漠的情况下，大家就非常相信这种理论。我自己的研究，我做调查就知道，到了春节的时候，河南省的一些群众、下岗工人出来游行，他们打的旗帜是毛主席的旗帜，拿的画像是毛主席的画像，他们的口号也是当初文化革命那些例如“打倒特权阶层”的口号，这点很值得注意。我最近很关注重庆的事情，重庆的造反派的所有的头儿狂热地拥护薄熙来的做法。那些造反派本来就是后来受到邓小平和陈云的清洗，本来有一肚子气，认为我们当初是忠于毛泽东，等于是忠于共产党，最后把我们全部打下去了，受到秋后算帐。大家现在一看，觉得毛泽东说得越来越有道理，你们就是走资派在复辟，在搞反政倒算，就是把中国带向资本主义道路嘛！

杨帆：你觉得薄熙来这么干是真的假的？

徐友渔：我认为是假的。在重庆，据我现在的了解，最狂热拥护薄熙来的，甚至于可能愿意为薄熙来上刀山、下火海，为他去拼命的就是文化革命中那批造反派，尤其造反派的头儿。两派当初打得不可开交，现在是共同一致狂热地拥护薄熙来。这是一种思路。另外还有一个思路，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文化革命我们这种狂热参与的人后来因为秋后算帐，我们这种人是有反思的，我对文化革命基本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但是在西方，1968年也有一个对应的造反，那批在文化革命中造反的巴黎学生、美国学生、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哈佛大学的学生、日本的、德国的学生他们有一个造反，西方学生68年的造反派跟中国的造反派下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受到清算遭遇非常悲惨，他们在民主社会，没有人清算他们，他们后来成为学者中的精英人物，现在他们是西方社会里的主流，他们有些在大学里是系主任和院长一级，他们坚持文革的观点，当中国抓了“四人帮”以后他们是非常愤怒的，他们说“毛泽东尸骨未寒”，他们把这种事情说成是中国右派的反革命政变，他们一直持这种观点。而很不幸的是，中国人到国外去学习的人，尤其到美国去学习的人，现在也是精英分子，他们到那里去以后，他们的导师是西方的左派，把那种文化革命的观点灌输给他们，这里最著名的人物、最典型的人物就是崔之元，崔之元到美国去留学，他的导师是美国的左派学者，教他们赞美文革那一套，所以崔之元后来发表的观点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这应该成为中国未来的政治建设的一个原则”。对于我们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比我们老一点的知识分子，“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革命，牛鬼蛇神要跳出来，我们要用无产阶级铁扫帚再把他们扫下去”，是非常恐怖和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这位可爱的崔之元，这种新左派，从西方老师那里学到这些东西以后主张的，他民主的模式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所以文化革命中那种造反派的自认为自己追求社会公正的东西，再加上现在社会不公正，所以文革理论很有市场；又加上中国现在在名牌大学（崔之元现在从美国回到了清华大学）有一批这种从西方的左派老师那里学到文革理论的教授，他们现在给中国的大学生灌输的也是文化革命的这种理论。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很可怕的，而且“两个文革说”给他们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所以我有一种估计，对于“文化革命那种大动乱和大斗争的事情还会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如果局势是稳定的，将投身于文革这代人马上就要彻底退出舞台了——比如我早就退休了，经历了文化革命最年轻的人应该是五十七八岁，他们过几年就全退休了——这代人就没有了，类似文革的现象就不会重现；而一旦中国社会失控的话，重新出现文化革命这样的东西，有人又用“打倒走资派”这样理直气壮的口号来惩罚官僚特权，出现大动荡，这种情况也可能出现。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在考虑未来的时候，假定社会有可能失控的话，文革这个维度就会出现，所以我们应该重视对文革的研究。

□ 来源：共识网2011-10-18



~~~~~  
【一家之言】

文革、自由派和毛派

• 袁庚华 •

〔本文为作者2011年5月25日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演讲。由于主讲人和主持人同意提问者可以打断主讲内容，录音中讲、问、答所涉内容次序较乱，本稿还是按主题归纳，最后经主讲者审阅修改并增删。〕

先谈一下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分歧。自从美国新保守主义在欧美乃至全球崛起后，人们在谈论两种自由主义，一种是新保守主义自认为的正宗的古典自由主义；另一种是被他们批判的并要清理出门户的现代自由主义。当前，和左翼一样，中国的自由主义阵营也在论战、分裂。中国的新左派有广义、狭义之分。所谓狭义“新左派”是指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理论为主要资源，在中国一些最主要学府里有自己学术阵地的左翼学者。广义上的新左派是指区别于“老左”的、九十年代以来兴起的广泛的左翼阵营。中国自由主义和民运的一个著名代表人物陈子明十年前曾有一篇文章《中国左派的光谱分析》，他把左派分为“马左”、“毛左”和“新左”。尽管在我们看来不是十分准确，但还是被很多人大致接受了。其中“马左”（马克思主义左派）就是“老左”，应以邓力群为代表，“新左”（狭义）则是以汪晖为代表。而老青两代毛左（毛泽东主义左派）至今还没有公认的代表人物，目前也不可能有。十年来“毛左”已成为中国左翼阵营的主体，一般称为“毛派”，也有称之为广义的“新左派”的。我今天所谈的自由主义就是指现代自由主义，还是叫自由派吧。所指的“新左派”则是广义的，我习惯叫毛派。

我认为，自由派和毛派的分歧主要是对过去（中国现代历史）和未来（各自要争取的中国前途）。

在对待历史的争论上，自由派取攻势。从文革、四清、大跃进、反右、合作化、公私合营、统购统销、抗美援朝战争、土改、镇反，一路颠覆下去，直到解放前的国共两党之争，一部中国现代史需要彻底颠倒过来看。而毛派则是在捍卫中国现代革命史。

在对待未来上，毛派取攻势，他们不会认同“全球化”的自由之路，也要颠覆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文明”。他们是要沿着毛主席开辟的另一条道路去建设一个崭新的世界。而自由派则是在捍卫他们的“普世价值”观。

两派在历史问题的争议中最热的话题是所谓“饿死几千万人”和文化大革命等问题。而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未来，两派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毛泽东这个人物身上。我上次来广外，本来主讲的是几代人的所谓“代沟”问题，却在“几千万人”的问题上，两派吵得一塌糊涂。今天我想就文革问题谈一点不同看法，欢迎争论。

李泽厚说，把文化大革命仅仅看成领导人的权力之争是肤浅的，也就无法理解亿万人爆发的热情。那么，文革开始时的造反激情从何而来？我认为，是文革前十七年中国社会不民主和官僚等级化的强烈压抑。

一些学者一再有意宣传共产党在解放前如何运用民主做武器，和执政的国民党政权作斗争。这是事实，如果当时毛主席共产党强调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而拒绝使用这个武器，那么就不会有反蒋的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被毛主席列为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首。也应该说，新

中国成立以后其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的民主成分，即广大群众参与的广泛性是从根本上好于民国时代。但是国家机器压迫大多数人的本质是任何力量执政都难以改变的（马克思要求砸烂），从旧社会接受过来的几百万公务员潜移默化的官僚传统，和取得资产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还不可能很快改变其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大批共产党干部结合在一起，仅仅十几年就形成了一个被毛主席称之为的“官僚主义者阶级”。1957年共产党整风的天折和反右的扩大化，更强化了其后社会的反民主和等级森严化。在文革爆发前的中国社会里，群众反对一个党员就被整成反党，反对一个领导、哪怕是最基层的班组长、生产队长，甚至大学里的一个政治辅导员，就被整成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整个社会的等级化越来越明显，特权意识越来越顽固。这就是当年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领导干部要巩固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也是毛主席从1958年到文革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矛头所指和文化大革命造反的对象。有趣的是，靠造反起家的共产党执政后却最忌讳“造反”这个词。文革开始时，毛主席过去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被学生重新翻了出来，一些城市第一次出现“造反有理”的大标语立即被公安局戒严。其实，群众开始造反时无非是用《毛主席语录》和领导讲理：你说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啊！是毛主席代表党代表党的领导还是你？！这就有些相似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信徒”和“上帝”应该是直通的，从而打倒了各级“主教”这些中介者的压迫和剥削。“一切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一时代替了“党领导一切”，衡量的标准是个人的认识。文革开始时的中国也必须有这样一个神圣的“上帝”的相对绝对权威，否则你就得接受从省市到公社、工厂的党委书记，一直到班组长、生产队长和辅导员等千千万万个“上帝”代表的压迫，你别无选择。当群众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尤其是自我组织起来后，一个森严的等级结构轰然倒塌。当时除了《公安六条》规定的不准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地、富、反、坏”四种人没有“四大”权力外，在中国大地上的任何地方任何人可以贴对任何当权派的大字报。不用审批，不用书号你可以任意出版任何报刊、书籍、传单；不用登记，你可以成立任何地区性的和单位里的任何社团、组织；不用申报，你可以在社会的任何地方示威游行，请问，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有哪个国家有过这样的大民主？！当然，文革中的专制也同样广泛、甚至严重的存在，我因政治问题几次坐牢不就是个例。不过，它主要是官僚阶级镇压文革的手段，不能因为有专制现象就否定其大民主。看一看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及其他史料，当年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其专制的程度不更甚于文革的多少多少倍，就是马丁·路德掌握权力后不同样专制？！但是人们不照样承认“欧洲人新型的个性诞生于宗教改革运动，政治自由、良心自由、人和公民的权利也是通过宗教改革运动向世界宣告的（布尔加科夫）”。文革中的暴力也大多数是党内军内的当权派（包括高干子女的组织）镇压文革的暴行。即使整个文革的暴力代价，相对来说也并不比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暴力代价大，甚至也小于今天“和谐”社会中不声不响的各种各样的“非正常死亡”——（文革中死一个人会喊遍全国）。说到底，文革的造反首先就是为了争民主。1966年冬，全社会起来造反后造反派的夺权对象首先是报纸和公安部门（连看守所的权也要夺），不就是为了话语权和人身权么？！不就是民主和人权么？！

文革中，一位来中国的美国人说，在美国你可以随意骂总统，可以向他投臭鸡蛋西红柿。在你们中国你们可这样对待毛主席吗？！中国人回答说，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工厂、单位、村庄，所有工人农民可以对任何当权派贴大字报批判他，后者却没有开除前者的权力。在美国，工人职员可以贴老板、经理的大字报批判他吗？！究竟是绝大多数人日常利益冲突中的民主、尊严重要，还是经常离你“十万八千里”的总统重要？！网上一些年轻人说，现在大大小小的国家都在指责中国的民主、人权的状况，可是翻一下文革中六、七十年代的报纸，却只有中国在全世界到处干涉别国的人权民主，比今天的美国还牛！例如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的声明一发表，全国成百上千万人上街游行，并推动全球的抗议浪潮。不客气地说，文革中的中国是在向全世界推销它的大民主。我这样说，并不是一笔抹煞西方的民主，那至少是对几百年来西方国家人民群众争取民主的斗争及其成果的不尊重。我也不认为，文革时的大民主状况如何完美，它只是代价极大的大“演习”。只是今天太多人太美化了西方的民主，太妖魔化了文革，我要唱唱反调。

如果说，有关文革的争论至少要持续好几百年以上（法国大革命、美国南北战争至今仍在争论），那么有关毛泽东的争论则恐怕要持续几千年。这里，我向各位老师同学推荐一位自由派学者的文章《茅于軾错在哪》，作者方绍伟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一个制度研究中心的主任，过去也是天则研究所的。作者的立场和对毛泽东的所谓“罪过”的认可上和茅老板是一致的。他首先批评茅，你既然不承认毛泽东是神，那么还用你去还原成人吗？！作者说：“红太阳永远不可能落下，因为毛泽东已经是中国人的一种象征，是一种民主文化信仰层次上的图腾。他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正统’，是华夷各民族血液里和基因中构成要素，是缺少它自己就什么都不是的本质。”作者说：“自由派认为，只要官方不阻挡他们讲道理，他们就能把更多事实摆出来，也能说服更多人。大错特错，官方不阻挡，反对他们的人只会更多，不会更少”，“自由派发动的这场战争必然以失败告终，他们甚至连一个小战役都不可能获胜”。此文是一副清醒剂。一些人认为，打倒了毛泽东就打倒了共产党，逻辑上是对的，实践上却是错的。即使打倒了共产党也打倒了毛泽东！任何政党组织都有从萌芽、发展到变质、衰亡的过程。但是一些信仰、主义却是不朽的，几大宗教是如此，马列毛主义更会是如此。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勃兰特评价毛主席在历史上的影响说的这段话应该还是比较客观的：“对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思想上、政治上永久的挑战，两种情况都将继续存在”。持那些太简单逻辑的人为了集中打击毛泽东，对党史上几乎所有和毛主席观点、政策不同的党的领导人都评功摆好。但是共产党任何时期的执政集团在这点上还是清醒的：共产党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就是继承毛主席领导革命取得的政权，如彻底否定毛泽东，就会随时把自己送上被审判台。用老百姓一句土话说，你是“坑死猫上树”。只要不失去这个前提，官僚集团比他们更需要非毛化，因为毛泽东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就是革命造反，他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又是对官僚集团最大的威胁。所以社会上越批毛，就越有利于掩饰、冲淡今天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有利于巩固现有利益格局和秩序。这样，辛子陵等反毛急先锋被称为（也自称）“救党派”就容易理解了。刚才老师说，自由派不要一直反毛啦，我认为是明智的。三十多年的反毛史也应该有一个反思，是不是一个死胡同，我甚至怀疑这是权贵集团设置的一个陷阱，引导一部分人去反毛，就必然和毛派及其广大群众对立并纠缠在历史问题中；同时又引导另一部分人去批“普世价值”，也必然和自由派及其大多数知识分子对立并纠缠在未来的问题上。对毛泽东时代的所谓“罪过”说的越重，就会对今天的社会问题看得越轻。对未来的担心越多，对今天的关注就越少。一些人故意渲染自由派上台就会使左派千百万人头落地，另一些人故意渲染毛派上台就会血流成河，他们故意制造这些恐怖，就是转移当今社会对权贵集团的不满，就是为了稳定现有社会的利益格局和秩序。

作为理念或意识形态，甚至阶级属性，以及对未来前途的争取上，自由派和毛派的一些重要分歧或许永远都不会统一，他们都应该正常存在，是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必须正视的。那么这两大思想流派、尤其是今天有没有一些共识呢，我认为在对待现实的社会问题上，两派有着极为重要的共识。

首先，自由派批判的权贵资产阶级和毛派批判的官僚资产阶级是一个共同的对象。这个对象既压迫了毛派也压迫了自由派，压迫了除官僚资产阶级及其附庸势力以外的一切社会阶级、阶层、群体和个人，这应该是两派的共识。官民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符合阶级斗争观点的。这个对象对外主动投靠美国霸权主义和跨国资本，同时也是肢解中国，亡国灭种的最危险因素。用一位红色企业家的话说，它还是以美国霸权主义为首的世界反动势力经济、政治上的主要支持者

其次，两派还应该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民主，尽管双方对民主的理解和具体要求有所不同，无论是资产阶级程序民主、大众民主，还是无产阶级大民主，首先是要民主。没有民主这个东西，包括我们这里所谈的左右派都是一种奢侈。有一种误解，认为毛派不要民主。要，就是需求，那么毛派有没有民主的需求呢？全国成千上万家报刊没有一家是毛

派观点、立场的，几千所高校、党校，能让毛派观点登上讲坛的凤毛麟角，影响微乎其微。仅仅靠几个又小又受很大限制的网站（它们对十三亿人口的直接影响恐怕只有千分之几）就满足了毛派对民主的需求了？那比阿 Q 还可怜，也是天大的笑话。比较起来，应该是毛派极其广大群众更渴求民主。在所谓“民主国家”中，也是左派更强调民主，在那些争取民主的社会中，民主更是左派的旗帜。应当承认，中国大多数自由派也是要民主的，又如何看待他们的左右角色呢？

毛主席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左中右在任何人群中都有，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对象其左右位置会有所变化。近十年前，中国社科院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演讲中说：“中国没有右派，因为政府是右的”。他前面指的是以批判主流为天职的知识分子，后者指的是政府的政策。“让少数人先富”恐怕是右的不能再右的政策，“效率优先，兼顾公正”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也被公认为是相当右的政策，连自称右派政府的小布什在其就职演说中也假惺惺地只谈公正，绝不敢提效率优先。那么批评右的政策和主流意识。就应该是左的声音，只是左的阶级性和具体要求不同。也就是说，在现阶段中国社会中批判权贵资产阶级和要求民主上，自由派的主体也应该是左派，用阶级划分的话是否属于中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可能不准确，请大家批评。

现今中国有一亿三千万人受过各种高等教育，其大多数是在 1976 年后的贬毛非毛妖魔化毛的高校环境中主要接受的是自由主义的理念，另外的那一部分也受这个社会环境的很大影响。所以毛派在批判自由主义理念时如果也把这个群体置于对立甚至敌对的角色，那将是最大的失策！对毛派来说，它倒应该是当前特别要重视的统一战线问题。一些人把民族矛盾宣传为中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要搞联蒋统一战线。反之，如果我们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话，那就要搞反蒋统一战线。不解决统一战线和民主问题，毛派就只能在自已很小的圈子没出息的自慰，放点空炮。自由派如果不从反毛的死胡同里走出来、不放下身架去和民众结合，同样是放放空炮、一事无成。统一战线和民主问题是两派当前的共同需求，毋庸讳言，两派将来在争取中国未来的道路上一定会是对手，但是不是今天。解决不了今天的问题，谁都不会有未来！

~~~~~

【各抒己见】

未完成非毛：历史的遗憾

• 郑也夫 •

（这是作者在 8·27 北京思想界批判极左回潮座谈会上的发言稿，9 月 4 日由北京《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发表。）

有一句流行甚广的话，我认为愚蠢并且霸道，就是：历史不做假设。如果历史是一盘下过的棋，历史学家们则一直在复盘。说历史不做假设，无异于取缔历史学。

三十年前《决议》中的闪光点，随着岁月的流逝日益暗淡。而《决议》中的荒诞吊诡之处则定格在那里，今天看是这样，昨天在明白人眼中也是这样——就是《决议》否定了文革，却没有否定文革的发动者和设计师。今天回过头来看，我感觉到的是深深的遗憾。加上两个定语，历史的遗憾，永远的遗憾。如果当时执政党不可能去否定毛泽东，我不会说遗憾。之所以说是极大的遗憾，是因为当时距离否定毛泽东只有一步之遥，却没有完成。

对中国人，对一代伟人邓小平，都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中国人民摊上了毛泽东这样一个领袖，三十年来苦难深重，他们有权利享受一个节日的巨大快感：彻底否定这个人。

对邓小平而言，这件事可做，但是没有做。三十年前非毛能导致中共垮台吗？不会的。二十大赫鲁雪夫否定史达林，苏共垮台了吗？邓与赫相比，互见短长。邓的资历更深，声望更高，当然也因此更深地裹挟到老板犯下的错误中，但邓的才能高过赫。非毛后的局面邓是可以驾驭的。毛的时代全体中国人都饱受愚民政策之苦，如果那时候经历一次否定毛泽东的思想风暴，我们的思想在不同程度上都会提升。接受了那次思想风暴的遗产，邓小平也将不是后来的邓小平。不会在80年代末期重蹈毛泽东的悲剧：接连腰斩自己的接班人。我的判断是，如果有了当时的非毛，中国的历史将改写。

太遗憾了。那个快感，中国人民永远也找不到了。那么现在还要做这个事吗？仍然需要。并且能做就要快做，再迟的话年轻人更麻木了，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现在不是有对立面吗？太好了，没有争论怎么吸引社会，吸引年轻人关注呢。现在非毛的意义是什么？毛泽东的罪过在于，他突破了人类文明的若干大限，非毛是为了捍卫人类文明的大限，如果我们不捍卫，我们这个民族不定什么时候还会突破人类文明的大限。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